

地区热点

埃及与阿盟的互动关系研究^{*}

赵 军

摘 要: 埃及与阿盟的特殊关系,外在表现为埃及主导阿盟的构建过程、引领阿盟框架下阿拉伯合作机制的基本发展方向,同时也是阿盟经费的重要提供者、阿盟总部的所在国和阿盟秘书长职位的长期占有国;内在表现为埃及民族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互动过程中的一致性与矛盾性。埃及与阿盟的互动实践表明,阿盟需要埃及这样的地区大国支撑才能发挥作用,埃及也需要阿盟泛阿拉伯主义体制来实现其部分对外战略目标和拓展其国家利益。两者的相互需求构成彼此关系的恒久支点,这种关系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关键词: 埃及;阿盟;阿拉伯民族主义;埃及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 赵军,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史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上海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5)05-094-1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属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般规划课题(14JDFZ03YB)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高校一流学科(A)类外国语言文学项目”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课题”资助。

埃及与阿盟之间的关系是特殊的。作为阿盟的一个主要创始国,作为阿盟总部所在地,作为阿盟经费的重要提供者,作为秘书长(除第四任秘书长外)职位的长期占据国,作为阿拉伯世界中的重要大国,埃及在阿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70多年来,在这个颇具“民主”色彩的区域组织里,埃及时而积极参与,充满希望;时而处于主导,呼风唤雨;时而极度失望,游离于组织之外;时而心有余,但力已不足。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造成了埃及与阿盟较为复杂的关系模式。对埃及来说,这种关系仍然会长期保持下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管是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雄心,还是埃及民族

主义抱负都少不了阿盟这一泛阿拉伯主义体制。而对阿盟来说,它也需要埃及这样的大国支持和引领,否则难有作为。

一、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埃及的发展与阿盟的建立

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埃及的确立,有一个历史过程。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埃及积极参与泛阿拉伯政治活动、认同阿拉伯民族身份的时间相对较晚。埃及参与组建阿盟的过程,对埃及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其从埃及民族主义走向阿拉伯民族主义过程的完成。

近代以来,埃及深受欧洲文明影响。英法殖民者带来的民族主义思想让埃及人民觉醒,十九世纪后期埃及阿拉比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加之穆斯塔法·卡米勒和穆罕默德·法里德等人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及其英勇献身行为加深了埃及人的自我民族认同,但对阿拉伯民族身份认同颇为有限。^① 埃及人认为,阿拉伯人弱小、不团结、没有清晰的民族认同。另外,埃及在对抗奥斯曼帝国时,阿拉伯人没有适时伸出援手,造成埃及人对阿拉伯世界偏见颇深。^② 直到20世纪初,埃及仍将其内外事务与其他阿拉伯事务截然分开,仍然认为亚洲阿拉伯地区的基本利益与埃及关系不大。1914年阿拉伯大起义爆发,埃及政府表示不支持。^③ 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埃及参会代表拒绝与阿拉伯领导人采取一致立场。时任埃及首相萨阿德·扎格鲁勒(Saad Zaghlul)甚至公开说,“我们的事情是埃及人的事情,而非阿拉伯人的事情”,“与阿拉伯人的合作是零加零的结果。”^④ 对于埃及拒绝认同阿拉伯民族身份的行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精神之父萨提·胡斯里(Sati al-Husri)有过严厉的批评并认为埃及的阿拉伯身份无可争议,虽然“埃及对阿拉伯世界冷漠无情”,^⑤但是“埃及无可置疑地属于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无论历史与文化都是如此”。^⑥ 1925年叙利亚起义改变了埃及对待阿拉伯世界的态度。埃及认为与阿拉伯世界是唇亡齿寒的共存关系,在诸多事务中不再纯粹强调埃及自身利益,也不再刻意与阿拉伯世界廓清界线,而是

① 蔡德贵、赵士珍:《1919年以前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载《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4期,第113~117页。

② Ahemed M. Gomaa, *The Foundation of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Wartime Diplomacy and Inter-Arab Politics 1941 to 1945*,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td., 1977, p.30.

③ Anita L. P. Burdett, *The Arab League: British Documentary Sources (1943-1963) (Vol.1)*, Archive Editions, 1995, pp.29-33.

④ Ahemed M. Gomaa, *The Foundation of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Wartime Diplomacy and Inter-Arab Politics 1941 to 1945*,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td., 1977, p.31.

⑤ 萨提·胡斯里:《民族主义思想根源演讲录》(阿拉伯文版),开罗1951年版,第17页。

⑥ 刘中民:《萨提·胡斯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与伊斯兰教》,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1期,第68页。

积极关注亚洲阿拉伯事务。这一重要变化,无疑预示着埃及明确走向阿拉伯民族主义怀抱。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埃及文化界和宗教界发起了有关埃及国家走向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使埃及朝野达成基本共识,形成一种把传统信仰(法老文化和伊斯兰教)、阿拉伯身份和西方世俗化糅合起来的新型社会文化。埃及社会各类泛东方、泛阿拉伯和泛伊斯兰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出,它们的跨国活动及思想论争与传播对埃及与阿拉伯关系发展起到了极为有力的推动作用。埃及对阿关系渐趋主动。1936 年 4 月,埃及与沙特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条约。5 月埃及在外交部和宣传部设立“阿拉伯事务局”,在商务部组建“阿拉伯特别委员会”。7 月法鲁克国王在就职演说中强调要巩固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埃及媒体不再使用“东方国家”等模糊用语,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兄弟国家”等强调埃及阿拉伯属性的话语。

在埃及主动发展与阿拉伯世界关系期间,1936 年 4 月爆发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起义赋予埃及进一步走向阿拉伯民族主义历史的契机。巴勒斯坦问题使埃及首相纳哈斯(Mustafa al-Nahas Pasha)推动埃及朝野从阿拉伯人的角度来考虑埃及的国家安全利益。纳哈斯明确表示反对巴勒斯坦分治。他说,“我们也是阿拉伯人,埃及对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感到不安,……谁知道贪婪的犹太人下一个目标不是西奈?”^①1937 年埃及外交大臣努克拉西在国际联盟的首次演讲中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涉及埃及利益。可以说,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因巴勒斯坦问题而变得空前密切,埃及的阿拉伯民族身份认同得到了强化。

在埃及政府积极参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同时,埃及国王法鲁克就开始具体构想阿拉伯世界的未来走向。他认为,只有恢复哈里发制度才能实现埃及对阿拉伯国家产生根本影响,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才能够云集在埃及周围。法鲁克派遣埃及乌里玛(Ulema)游说伊斯兰国家,宣传其恢复哈里发制度的计划:在埃及设立哈里发;在其他伊斯兰国家各设置一个副哈里发;在开罗建立常设最高伊斯兰理事会。1938 年,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代表到埃及参加巴勒斯坦防务会议,该会议被埃及媒体普遍称为“阿拉伯伊斯兰团结盛会”。在开幕式宣布与会者名单后,会场上响起了“信士们的长官——法鲁克一世万岁”的口号。1939 年初,参加巴勒斯坦问题巴黎圆桌会议的部分阿拉伯代表中途在开罗集会,在一次周五的聚礼中,王室人员阻止伊玛目按照惯例主持祈祷,法鲁克就像拥有哈里发权力一样,亲自主持祈祷仪式。法鲁克离开清真寺时,“哈里发万岁”的口号再次响起。

法鲁克之所以渴望建立一个新的阿拉伯伊斯兰联盟,是因为他相信这个联

^① FO371-19980; David Kelly to Eden, 4 September 1936.

盟是埃及持久参与地区事务必不可少的工具。按照他的设想,要解决中东地区问题,协调各国之间的关系,就需要某种具有泛地区意义的组织,而建立一个阿拉伯伊斯兰联盟便于埃及做出理想的地区安排。但是,由于英国、部分伊斯兰国家和埃及国内知名人士的坚决反对,法鲁克恢复哈里发制度的企图未能得逞,这也意味着埃及以宗教路径来获得阿拉伯身分认同和阿拉伯世界主导权的失败。

二战的爆发再次赋予埃及历史的契机,战争使英国改变以往的既定政策,转而支持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这一情势促使埃及首相纳哈斯在国内外不遗余力地推动埃及主导的阿拉伯统一计划。1942年11月13日,纳哈斯对华夫脱党发表演说,宣称埃及将不遗余力地为实现姊妹国家的愿望而奋斗:“把我们同阿拉伯和东方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多不胜数,且牢不可破。……而这些纽带也就更加坚固有力。在这次大战中,它们全都盼望民主的胜利,期待新时代黎明的到来,……到那时候,这些阿拉伯国家以及毗邻的东方国家将成为一个以埃及为先锋的强大而紧密团结的集团,能履行其世界职责及其道义任务,并能自立于自由民族之林。”^①纳哈斯不仅强调了埃及的阿拉伯身分,而且毫不掩饰埃及要主导阿拉伯世界的雄心。纳哈斯竭力反对其他版本联盟计划的同时,表达埃及引领阿拉伯世界的意愿,并向其他阿拉伯国家积极推销埃及版“阿拉伯国家联盟”计划。1943年2月埃及极力反对伊拉克总理努里·赛义德(Nuri al-Said)提出的旨在最终实现阿拉伯世界完全统一的“肥沃新月计划”。纳哈斯明确表示,要保证阿拉伯现存的主权结构不变和阿拉伯政治实体的独立存在,反对阿拉伯国家重定版图,并且埃及在阿拉伯联合问题上应站在阿拉伯集团的“最前列”。^②1943~1944年间纳哈斯积极与伊拉克、沙特、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等国领导人进行多次会晤和磋商并达成初步共识之后^③,1944年9月阿拉伯各方草签《亚历山大议定书》,框定阿盟的基本架构。1945年3月22日《阿盟公约》获得通过,宣告阿盟成立。

阿盟的诞生应该说是埃及、伊拉克、沙特、叙利亚、黎巴嫩和外约旦等创始国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埃及显然起了主导作用。埃及积极推动建立阿盟的活动,既反映了埃及实力地位的上升和对埃及民族利益的追求,又折射出埃及追求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边界。它固然希望通过维护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团结来维护埃及的利益,但更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无可争议的阿拉伯世界的领导

① 阿诺德·托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战时中东》(第六卷),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页。

② Bruce Maddy Weitzman,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Arab System*,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4.

③ 阿诺德·托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战时中东》(第六卷),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337页。

者。表面上,阿盟的建立,标志着埃及已经从狭隘的埃及民族主义身分完成了向阿拉伯民族主义身分的认同和转型,但在本质上则预示着埃及以新的身分来争夺阿拉伯世界的主导权的开始。

二、埃及的理想与阿盟的现实

《阿盟公约》通过后,埃及朝野上下意见不一。法鲁克国王是支持这一公约的,他在重建哈里发制度失败后,就深悉阿拉伯各路当权者并非真正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以实现阿拉伯统一,从而转向建立一个以经济和文化合作为主的非中央集权式阿拉伯邦联。^① 埃及华夫脱党(Wafd)对《阿盟公约》持批评态度,一是因为其党魁纳哈斯在《亚历山大议定书》签署后就被免职,二是因为《公约》强调的是各政治实体的主权,建立的是一个协调机制而非真正统一的阿拉伯联邦,没有提及未来的阿拉伯统一。这实际上已经抛弃了《亚历山大议定书》确立的“阿拉伯政治实体逐步放弃主权以达至统一”的核心规定。但是,不管如何,各国代表一致同意在《阿盟公约》外加附件以及确定开罗为阿盟总部永久驻地,使埃及人还是自信地认为已经获得了阿拉伯世界的主导权,并相信阿盟是阿拉伯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行为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服务于外交谈判的场所。同时认为这个泛阿拉伯框架体系与埃及的国家利益存在重大的利害关系。不少埃及人是以埃及的方式来看待阿盟的。埃及外交大臣努克拉西认为,“阿拉伯国家代表本来可能达成一个比《公约》更为强大的联盟计划,但是,国家联盟需要政治家和当权者的培育并引导走向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不能强加。”^②或多或少,埃及人确信这一制度设计大体合乎阿拉伯世界的现实,并且认为在一定时期内通过这个阿拉伯机构能够改造其他的成员。

埃及建立阿盟的初衷,就是想通过一个泛阿拉伯机构完成阿拉伯民族身分的认同,进而攫取阿拉伯世界的主导权,最终实现埃及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在阿拉伯世界的进一步拓展。但是,阿盟所确立的体制,是一个参照国际联盟的制度安排、形式上表现为成员国平等的民主体制。阿盟理事会有关的表决制度,就是实现这种民主政治的保证。在这种制度设计中,理论上某个成员国要实现阿盟的绝对主导权是很难的。因为阿盟所确立的成员国平等一致原则,只有“经一致通过的理事会的决议应对联盟全体会员国有拘束力;由多数票通过的理事会的决议仅对赞成国有拘束力。”^③换言之,只有在成员国一致的情况

① Israel Gershoni, “The Emergence of Pan-Arabism in Egypt”, *The Muslim World* 77, 1987, pp.63-65.

② Ahemed M. Goma, *The Foundation of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Wartime Diplomacy and Inter-Arab Politics 1941 to 1945*,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td., p.263.

③ 《阿拉伯国家联盟公约》,载《中东问题 100 年》(尹崇敬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

下,它才可以实现泛阿拉伯合作,如果不一致,则这种泛阿拉伯合作或团结就难以真正存在。也许埃及领导人认为阿拉伯国家在阿盟中的活动可以像在反对联合国 181 号阿犹分治决议时那样携手合作,但事实上,这种合作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埃及、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对阿盟联军军事指挥权的争夺及在战争结束后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对巴勒斯坦领土的“瓜分”,使阿盟成员国之间的根本分歧充分暴露,自私自利的行为昭然若揭。^①这证明了作为意识形态联盟的阿盟^②的本质缺陷,因为“意识形态对联盟的凝聚力而言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③因此,埃及历史学家拉菲伊(Abudul Rahman al-Rafii)一针见血地指出:“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政府既缺乏合作的真诚,也缺乏彼此合作的渴望。”^④这似乎说明了一点,就是法鲁克时期的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抱负并未得到真切的落实,在阿拉伯根本利益问题上埃及在阿盟中也没有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

1952 年革命政权建立后,埃及的政治倾向及其对外战略目标的厘定与实践,试图打破阿盟这种“联”而不“盟”的局面。纳赛尔政权通过设定“三个圈子”的对外战略目标,确立了埃及对外战略的基本立足点及最终归宿点,那就是作为基本纲领的埃及民族主义和作为最高纲领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埃及举起泛阿拉伯主义大旗,通过占据阿拉伯民族道义制高点试图对接两大目标。纳赛尔借助苏伊士运河战争,锻造出“阿拉伯雄狮”、“当代萨拉丁”等阿拉伯民族英雄的形象;通过瓦解巴格达条约组织,埃及进一步确立了其在阿拉伯世界中的支配地位和引领作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则是埃及从领导阿拉伯“团结”到阿拉伯“统一”的转型尝试;而对阿尔及利亚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大力支持,是赢得阿拉伯民众对埃及领导地位普遍认同的重要路径。^⑤

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前,埃及在阿盟组织俨然有呼风唤雨之势,其他阿拉伯国家显得唯埃及马首是瞻。这一时期有人戏称阿盟为“埃及外交部的分支机构”。^⑥当然,埃及这种支配性地位并不绝对稳固,随着阿拉伯国家纷纷独立并加入阿盟。它们之中一些国家并没有在所有问题上都追随埃及领导的意愿,

① 汪树民:“阿拉伯国家内部冲突与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失败”,载《史学研究》,2002 年第 10 期,第 25~29 页。

②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1~242 页。

③ Ernst B. Hass, Allen Whiting,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5, p.168.

④ 阿布杜·拉赫曼·拉菲伊:《埃及起义之余波》(阿拉伯文版)(第 2 卷),开罗 1951 年版,第 142 页。

⑤ Tawfig Y. Hasou, *Struggle for the Arab World: Egypt's Nasser and Arab Leagu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reface.

⑥ Istvan Pogany, *The League and Peacekeeping in the Leban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p.24.

在有些问题上往往有悖于埃及的立场,从而对埃及的地位产生重要影响。如叙利亚退出“阿联”之时,大部分阿盟成员国态度明显偏向叙利亚,导致埃及以“退出阿盟”相要挟。^①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阿方惨败而告终,战争使阿拉伯民族主义遭遇“滑铁卢”,占据道义制高点的埃及和泛阿拉伯主义象征的阿盟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大打折扣。^② 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阿盟理事会在涉及阿拉伯国家利益重大问题的全体一致通过的决议有所减少。埃及开始尝试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实践中抽身,如试图利用阿盟以实现在也门内战中与沙特和解,但最终失败而不得不单方面从也门撤军。另外,1970 年沙特组建伊斯兰会议组织也充分表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支配性地位有所下降。尽管埃及与其他阿盟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及反殖民问题上仍然能够达成共识,但这与“阿盟看起来像是某个大国支配的组织,主要是埃及”^③的看法开始渐行渐远。纳赛尔逝世后,埃及与阿盟关系变得微妙。萨达特对实现阿拉伯国家统一并不抱有任何幻想,并期待从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泥沼中尽快抽身,但其仍不忘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主导地位,以在阿盟平台上实现引领阿拉伯世界的作用,进而实现埃及的国家利益。^④ 萨达特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即是这种心理的真实显现。虽然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萨达特实现了上述目的,但是之后以国家利益为基点构筑的对以色列“和解”政策并未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即时追随和响应。1978 年 9 月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该协议为埃及赢得了与以色列的和平,却几乎输掉了整个阿拉伯世界。

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空前孤立,17 个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绝外交关系,阿盟中止了埃及的成员国资格。埃及似乎回到了孤悬于阿拉伯世界之外的历史原点。埃及面临如此处境,使得埃及朝野对阿盟存在极大不满。埃及对阿盟贡献最大,到头来被阿拉伯国家唾弃。不过,整个八十年代阿盟对埃及政策在矛盾中展开,一方面阿盟成为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裂和抨击埃及的场所,另一方面成为审视和认同埃及对以和解战略的讨论场。

穆巴拉克主政埃及后,把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放在对外关系的首位,认为这是埃及外交政策的基石,并将重返阿盟作为一项奋斗目标。^⑤ 埃及采取积极、

① Tawfig Y. Hasou, *The Struggle for the Arab World: Egypt's Nasser and the Arab Leagu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1.

② Adeed Dawisha, *Arab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14-251.

③ Anwarel Sadat, *In Search of Identity: An Autobiography*, London: Collins, 1978, p.239.

④ 乔贵敏:《埃及对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政策及实践探析 1945~1991》,2009 年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摘要。

⑤ 时延春:《重返阿盟的埃及》,载《世界知识》,1989 年第 15 期。

主动、耐心做工作与克制、忍让、等待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埃及保持了与已断交的阿拉伯国家在经济、贸易、文化、双边人员往来等方面的实质关系,另一方面巩固了未与其断交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1989年5月,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召开的阿拉伯特别首脑会议上通过关于埃及重返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决议。埃及旋即恢复了在阿盟的一切活动。

1990年8月海湾危机爆发,伊拉克用武力吞并科威特。这是阿盟建立以来最严重的内部危机,即一个成员国武力兼并另一成员国。危机期间,阿盟首脑会议迟迟难达共识,意味着阿盟国家之间存在深刻分歧,而最终声明证明阿盟内部的确已经四分五裂,也预示着阿盟框架下寻求解决之法的失败。面对此情此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只能发出无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呼唤,“伊拉克人民是埃及人民和阿拉伯民族的兄弟,我们不想让阿拉伯民族成为两个民族。我们不想阿拉伯民族受到恶毒的目的欺骗而分裂,从而使他们在同一民族内部发生战争。”^①从此,阿盟已经难以成为解决阿拉伯政治问题的中心舞台。

海湾危机尽管将回归阿盟后的埃及拉回到阿拉伯政治现实轨道中,但埃及仍然初心未改,念念不忘主导阿盟。当然,埃及的确有如此想法的理由。首先是埃及在阿以问题上的引领作用。埃及坚持执行对以色列和解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其他阿盟国家的认同。2002年3月“阿拉伯和平倡议”就是最佳注脚。其次,埃及是阿盟改革的提议者和支持国,如2001年起阿盟首脑会议机制化,就是埃及的杰作。再次,泛阿拉伯自由贸易区也是埃及提议并积极推进的结果。当前阿盟与过去相比在经济合作方面更愿意采取行动,更愿意扮演推进阿拉伯经济民族主义实现的角色。它频繁出台相关经济措施,推动阿拉伯经济一体化进程。从埃及方面来说,它也比过去更愿意在阿盟框架下开展经济活动,以实现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补。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倡议获得阿盟首脑会议表决通过并启动后,埃及在阿盟框架下已经与利比亚、叙利亚、突尼斯、摩洛哥、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等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截至2012年底,该自贸区实现2.1万亿美元的交易,埃及贸易顺差高达4000万美元。^②

事实表明,阿盟需要埃及的支持,埃及也需要阿盟的平台。埃及之所以需要阿盟,是要利用阿盟的泛阿拉伯体制来确保自己在阿拉伯世界领导地位和引领作用。而阿盟需要埃及这样的大国支持才能在地区问题上发挥作用。

三、中东剧变中的抉择

曾有学者指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成员国对于一个组织的支持力度与该

^① 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9 May 1991.

^② 王俊鹏:《大阿拉伯自贸区贸易持续增长》,载《经济日报》,2013年7月15日。

组织对其国家利益服务的程度大致呈正相关关系。^① 自中东剧变以来,阿盟显得异常活跃,强势介入利比亚危机、叙利亚内战、也门危机和“伊斯兰国”崛起等地区安全问题,似乎有重回阿拉伯政治中心舞台之势。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上,从调停该国危机、政治经济制裁巴沙尔政权到公开介入内战等整个发展过程中,阿盟的干预是值得关注的。而阿盟以决议方式公然干涉成员国内战的行为在阿盟发展史上尚属首次。当然这与埃及的坚定支持是不可分割的。埃及穆尔西政权为增强阿盟决议的权威性及其有效实施,召回驻叙利亚大使、支持阿盟与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断绝一切外交关系、投票赞成叙利亚全国联盟拥有在阿盟组织的合法席位以及配合阿盟对叙利亚的政治和经济制裁。从埃及方面来说,埃及穆尔西政权及之后的塞西政权全面支持阿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与埃及长期坚持的对外战略指导思想有关。当代埃及对外战略本质上仍在“三个圈子”指导下展开的,使埃及一直把确保其阿拉伯世界领导地位作为其外交战略的首要目标。^② 这种战略思想,使埃及不得不进一步加强同阿盟的联系,不得利用阿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体制和干涉主义态势,不得不以各种方式争取在阿盟的主导作用。埃及支持打着阿盟旗下各种干涉行动,是要继续利用阿盟体制来阻止自己的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的弱化和重塑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形象的客观现实。^③ 这在 2014 年 6 月 8 日塞西总统就职演讲做了重新宣示:“埃及在未来的任务就是重回历史使命,维护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民族的稳定。”^④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埃及会“把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放在重要地位,同时也会注意处理好同欧盟的关系。”^⑤

第二,同中东剧变后的地区格局变化紧密相关。中东阿拉伯政权发生剧变后,阿拉伯政治地缘格局发生了质的变迁,出现“西”弱“东”强之势。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等阿拉伯传统地区强国彻底衰落。埃及因自身危机重重,元气大伤,国家能力相对衰落,政治影响力大不如前。相比之下,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海合会国家政治经济影响力发展势头强劲。中东剧变期间,由海合会国家提议并在阿盟首脑会议和理事会会议获得通过的议题明显增多。埃及穆尔西政权和塞西政权更多地借助于支持阿盟决议,来与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和科威特等海合会“金主”国家亲近,以获取它们的经济支持和政治认同来帮助政权

① Leland M. Goodrich and David A. Ka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olitics & Proces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3, p.28.
② 王京烈:《埃及外交政策分析》,载《西亚非洲》,2006 年第 4 期,第 27~35 页。
③ 王泰、王恋恋:《埃及过渡政府的外交政策之调整》,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23 页。
④ 国际在线:《埃及当选总统塞西宣誓就职 称要使国家“重回历史使命”》,http://gb.cri.cn/42071/2014/06/09/5931s4568966_1.htm。(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21 日)
⑤ 杨福昌:《塞西当选总统后的埃及形势》,载《西亚非洲》,2014 年第 5 期,第 10 页。

渡过财政危机。^①就这一点说,埃及支持阿盟存在非常时期无奈选择的成分。但由于“海合会国家同埃及是兄弟国家,援助埃及稳定局势,对地区、对他们都有利,因此,他们对埃及的援助是不会断的。”^②

第三,与阿盟被视为实现埃及国家利益的工具有关。有学者曾指出,“在本质上,世界上的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把国际组织看作是工具,通过这种工具,它们能发展它们各自国家利益的某些方面。”^③其实,任何阿拉伯国家在处理与阿盟的关系时,都存在利益问题,它们都会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埃及更是突出,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等无不如此。塞西上台后,人们看到埃及正通过阿盟实现其作为主导力量回归地区舞台的努力。安全上,埃及试图突破原来各种安全机制的束缚,尝试建立新的安全机制。2015年3月阿盟首脑峰会期间,埃及积极支持阿盟组建一个名为“阿拉伯联合部队”的“准联盟”机制。塞西认为阿盟是阿拉伯世界齐心协力地应对危机和增进彼此互信的最重要平台。^④经济上,埃及强调阿盟框架下合作机制的有效性。2015年4月埃及工贸部发布报告认为,尽管地区动荡,但埃及与阿盟国家2011~2014年贸易额逐年增长,分别为678.5亿英镑、771.5亿英镑、900亿英镑和1067亿英镑。^⑤

埃及的利益特点在于它的阿拉伯属性。从理论上讲,阿拉伯世界任何国家的具体利益问题,都有可能与埃及的利益相关。反过来说,维护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具体利益,埃及都有可能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这种情况反映了埃及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本质上存在的固有矛盾,也是埃及阿拉伯主义理想与阿盟捍卫主权独立实践中难以协调的根本原因之一。

然而,埃及国内各方对埃及与阿盟的相互关系的反应不一。目前在埃及国内,实际上存在着多种相对独立但又相互交错的政治思潮。具有阿拉伯民族主义倾向的人主张加强埃及的阿拉伯世界领导作用,增强对阿盟的支持,扩大对阿盟的参与。有媒体认为,埃及责无旁贷,阿拉伯世界的无序状态需要埃及发挥主导作用。^⑥对阿盟持支持态度的人往往主张在对外政策上实行多边主义。有阿拉伯学者早就指出,中东地区尤其是阿拉伯世界,面对的是一个杂乱无章的环境,还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环境,取决于阿拉伯国家是否能够通过阿盟来促进

① 阙静文:《沙特与卡塔尔争当中东老大》,载《国际先驱导报》,2014年3月14日。

② 杨福昌:《塞西当选总统后的埃及形势》,载《西亚非洲》,2014年第5期,第7页。

③ Leland M. Goodrich and David A. Ka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olitics & Proces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3, pp.27-28.

④ 刘水明、王云松、韩晓明:《阿盟原则同意组建联军 难解地区棘手问题》,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330/c1002-26771296.html>。(上网时间:2015年6月16日)

⑤ 环球网:《埃及与阿盟国家贸易未受政治动荡影响》, <http://china.huanqiu.com/News/mofcom/2015-04/6309249.html>。(上网时间:2015年6月16日)

⑥ 《埃及外长动荡时期接掌阿盟重振影响力任务艰巨》,载《东方早报》,2011年5月17日。

各国的利益。但是,这种主张让人们似乎看到了阿盟组建过程中,一部分埃及人的态度。这种倾向的人群因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埃及的失败而不断衰落,当前其影响力相对较弱。如埃及著名纳赛尔主义者、左翼政治家哈姆丁·萨巴西在 2014 年埃及大选中的落败就是明证。

而一种新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在埃及社会中颇有市场,这种思潮超越了宗教和世俗之间意识形态对垒的边界,以追求社会正义和自由而非空洞口号为目标,强调“经济尊严(生活质量)、政治尊严(个人权利)以及外交尊严(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上,埃及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引起民众不满)。”^①持这一主张的民众支持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和叙利亚发生的政权更迭,对待阿盟持有中庸态度,在传统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埃及民族主义之间的现实中徘徊。^②

与此不同的是,带有狭隘埃及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则认为,阿盟不是联盟,尤其不是埃及单边外交政策倡议的替代者。在主权国家构成的阿拉伯世界中,阿盟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超国家政治行为体,它只在个别情况下是服务于与埃及利益并行不悖之利益的有用工具。他们主张对阿盟持更加审慎的现实主义态度:可利用阿盟时就利用之,不能利用时则自己干。埃及学者指出,阿盟尽管与若干年前相比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组织,其作用难有建设性,但组成它的国家毕竟具有不同的哲学和政治体系以及不同的国家利益。在能够对这样的组织加以有效利用之前,不应该给它更大的权威和更多的资源。^③而带有伊斯兰激进主义倾向的人则认为,埃及的世俗政权本身就是一种错误,阿盟是这种错误的衍生。但是,他们主张埃及应该利用阿盟完成其政权意志,然后支持整个伊斯兰世界。这在相当程度上与泛伊斯兰主义暗相契合。

从当前情况看,埃及对阿盟的政策将不断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但是,从埃及历届政权来看,不管是军人政权、临时政权还是穆兄会政权,埃及政府都给予阿盟较为有力的支持,可见的将来埃及恐怕既不会放弃阿盟,也不会对阿盟有更多的承诺。(新)阿拉伯民族主义、狭隘的埃及民族主义以及伊斯兰激进主义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争斗,使埃及在阿盟平台上已经明显充当次要角色。尽管塞西政权在阿盟中的话语权有所增强。但是,不难看出埃及当前奉行的应该是最低纲领主义的对阿盟政策。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对于阿盟,埃及虽然仍有许多美好愿望并经常付诸行动,但埃及学会了中庸之道。

① 咎涛:《历史视野下的埃及革命》,载《文化纵横》,2011 年第 2 期,第 40~44 页。

② Lamis Andoni, “The Resurrection of Pan-Arabism”,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1/02/2011121115231647934.html>. (上网时间:2015 年 6 月 16 日)

③ Salah Nasrawi, “The Arab League at 70”, Issue No.1238, 19 March, 2015, *Ahram Weekly*.

四、结 语

就埃及与阿盟的未来关系而言,确实充满不确定性,但也许可以肯定以下几点:一是阿拉伯世界至今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能取代埃及曾取得过的那种阿拉伯世界领导地位;二是阿拉伯世界也没有任何其他泛阿拉伯组织可能取代阿盟的地位;三是在埃及不可能有完全抛弃阿盟的任何其他主义或思潮占据主导;四是不管阿盟如何强力参与阿拉伯事务,它绝不会变成巨无霸式的超国家组织,但也不会因无力解决阿拉伯事务而解散。这些基本点决定两者的关系不可能有大的改变,因此,从长远来看,人们对阿盟的前景只能看到埃及强则阿盟强,埃及弱则阿盟弱的局面,阿盟需要埃及这样的大国支撑才能发挥作用,埃及也需要阿盟的泛阿拉伯主义体制来实现其部分对外战略目标和拓展其国家利益。两者的相互需求构成彼此关系的恒久支点,这种关系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尽管当前海合会国家把持阿盟,但这仅仅是埃及弱态之下海合会暂时“主管”罢了。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gypt and Arab League

ZHAO Jun

(Zhao Jun,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World History Programm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pecial relations between Egypt and Arab League are indicated apparently through Egypt's domination in Arab League construction, Egypt's guiding the direction of Arab cooperation mechanism development within Arab League framework, and Egypt's role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Arab League funds, the nation where Arab League headquarters are located and which holds the position of secretary-general of Arab League for a long record. In addition, the relations are indicated internally through the uniform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gypt's nationalism and Arab nationalis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gypt and Arab League shows that Arab League would play its role only with the support from such a power like Egypt while Egypt needs Arab League Pan-Arabism to realize some of Egypt's foreign strategic goals and to expand its national interests. The mutual needs of the two have become the eternal sustainer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hich will last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Key Words Egypt; Arab League; Arab Nationalism; Egypt's Nationalism

(责任编辑: 钱学文)